

新 闻

研 究

资 料



新 华 出 版 社

新闻研究资料 (丛刊)

一九八一年第一辑

(总第六辑)

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
《新闻研究资料》编辑室编辑

新华出版社

新闻研究资料

一九八一年第一辑

(总第六辑)

•

新华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新华社印刷厂排版

北京零件一分厂印刷

•

787×1092毫米 32开本 9.625印张 180,000字

1981年7月北京第一版 1981年8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统一书号：7203·009 定价：0.80元

目 录

关于世界日报

我与世界日报…………… 张友渔 (1)

采纳意见 改进版面

——一九三一年七月至一九三七年七月的

世界日报…………… 贺逸文 左笑鸿 夏方雅 (24)

关于新华日报

回忆新华日报

——记重庆老新闻工作者座谈会

…………… 新华日报史研究组 (52)

关于新蜀报

回忆从大革命到抗战时期的新蜀报…………… 周钦岳 (77)

肖楚女在新蜀报…………… 郝 谦 (91)

回 忆 录

我所了解的新闻报…………… 陶菊隐 (97)

救亡日报在桂林

- 夏衍同志鏖战漓江之滨…………… 戈 今 (113)
- 香港文汇报创刊的前前后后…………… 黄立文 (119)
- 和斯诺相处的日子…………… 马汝邻 (131)

人 物 春 秋

- 老大哥张恨水…………… 张友鸾 (145)
- 忆恨水先生两三事…………… 张友鸿 (149)
- 写作生涯回忆…………… 张恨水 (155)

报 刊 史 料

- 抗日战争前的新民报…………… 赵纯继 (203)
- 申报关于杨乃武案的报道始末…………… 徐载平 (236)
- 平津新闻学会史料…………… 贺逸文 (262)
- 国民党统治时期报业遭受迫害的资料…………… 王文彬 (276)
- 告读者…………… 本刊编辑部 (302)

我 与 世 界 日 报

张友渔

我开始给世界日报写稿时，是一个对现实不满，有些模糊的社会主义思想的穷学生。世界日报的创办人成舍我当时是野心勃勃想效仿美国新闻大王霍斯特（William Randolph Hearst），在中国当一个新闻大王的人。他于一九二四年四月创办了世界晚报，于一九二五年二月十日又创办了世界日报，同年十月一日又创办了世界画报。蒋介石、汪精卫相继叛变革命后，他又到南京创办了民生报，到上海创办了立报。这几份报纸中，只有世界日报是一份大报，办得时间也最长。成舍我靠之以起家的报纸，也就是世界日报。他为了适应社会潮流，抬高世界日报的威信，在报纸上比较大胆地刊登一些左倾的新闻和文章。这张报纸，虽然也登“剿匪戡乱”的东西，可是也登揭露国民党反动方针政策的东西。在当时的国民党统治区，能登揭露国民党的东西，就颇能赢得一些进步读者的好感。所以，世界日报在社会上，特别是在知识界很有影响，可以说是中间偏左的一张报，被称为“粉红色”的报纸。由于成舍我要使报纸呈现“粉红色”，在报馆的用人上，他也要用一些进步人士。我刚开始给世界日报、世界晚报投稿时，我稿中对现实的不满和模糊的社会

主义思想，为世界日报、世界晚报所需。后来，我转变成为共产主义者，入了共产党。成舍我明知我的政治主张，但是还要重用，请我主持社论，负责《社会科学副刊》，当总主笔，看报纸清样。这种合作，当然并非志同道合。在他，是利用我增加报纸左的色彩，以此吸引读者，目的在抬高身价。在我，开始投稿是为了糊口，后来是利用这张报纸，采取合法斗争的手段，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罪恶，尽可能地宣传我们党的一些方针政策。

由于上述原因，我和世界日报的关系长达十年，从一般投稿人到世界日报主笔，直到一九三四年七月，戏剧性地离开了世界日报。

从投稿到编辑

一九二三年夏，我在太原第一师范学校毕业了。这个学校有个制度：学生毕业后，由学校组织到各地参观，参观的费用由学生出生地的县政府出。有的县政府有钱或者对于此事比较慷慨，给每个学生一百来块钱。我的家在山西省灵石县。和我同年毕业的，全县有四、五个师范毕业生。县政府给我们每人四十块钱。我们拿着这四十块钱来北平参观。当时是暑假，正值北平各大学招生。我决定留在北平考大学。结果考上了法政大学，我就在北平住下来。因为家境贫困，我上大学完全要自食其力才行。于是，我一面上大学，一面写杂文，给报馆投稿。当时，帝国主义继续支持各派军阀进行内战，民众生活穷困，知识分子寻求政治上的出路，精神

上很苦闷。我给报馆写杂文，一来可以得稿费，解决我上大学的费用；二来我借此抒发一下自己的心绪，减轻一下心中的苦闷。我写了杂文投给两家报馆。一个是陆少游主编的东方时报中文版，差不多每周一、二篇。每篇稿费五角。不久，我当了这家报馆的特约撰稿人，固定月工资15元。我把杂文投给另一家的报馆，便是一九二四年四月刚刚出版的世界晚报。我的杂文登在世界晚报的文艺版《夜光》上。文艺版是第四版，当时叫做“报屁股”。每篇稿费也是五、六角。一九二五年二月，成舍我把世界晚报扩大成两个报：世界日报和世界晚报。世界日报的“报屁股”上登了条招考特约撰稿人的广告。投考的人不用去报馆考试，只要把自己写的稿件寄几篇去，请报馆审阅。和我同时被录用的有四人，其余三人是马彦祥、胡春冰、朱虚白。我们这几个特约撰稿人每月工资也是十五元。我一个月有三十块钱的工资收入，除了上学、吃饭、穿衣，还可以买些书籍了。比我初到北平的几年，每月只花几块钱的生活是大大改善了！世界日报文艺版《明珠》和世界晚报文艺版《夜光》的主编都是张恨水。我把稿子寄给张恨水，由他决定用于世界日报的《明珠》，还是世界晚报的《夜光》。这是我和世界日报开始接触的情况。

这个时期，我还站在国民党立场，虽然对社会的现状不满，但只有模糊的社会主义思想，没有明确的共产主义目标，在政治上是犹疑彷徨的，情感上是忧伤的。我通过给世界日报、世界晚报写杂文，来呼喊我对社会上的不平和愤怒，来抒发我心中的郁闷和忧愁。我常用的笔名之一就是“忧疑”。

以“忧疑”为笔名写的杂文大都是为劳苦人民的贫困生活鸣不平的，如《车夫武大》等。《车夫武大》的内容大意是，我从北平回山西老家，下了火车后坐上一辆人力车。一路上，我和车夫聊起天来，问他拉车能给家中寄多少钱。他凄惨地说，拉车只能自己糊口，顾不了妻子儿女。他哭了，说：“我一年多了，一个大子也寄不回去。”但劳动人民的出路在哪里？中国的出路在哪里？我当时是看不到的。因此，杂文表现出来的心情是悲伤、绝望的。有些杂文，简直是我悲愤绝望的哭泣，如《一封来信引起的伤感》。内容是叙述我接到友人的一封信，知道了一个年轻有为的朋友在贫病交加下死亡了。这样好的青年，为什么得到这样残酷的遭遇？！我便以杂文来当悼词，悼念我的好友，发泄我的悲痛与气愤，质问吃人的社会为何如此不公！后来，我把笔名“忧疑”改为“有疑”，在世界日报的《明珠》版，发表了《先打倒政治上的偶像》《纸老虎禁不起一戳》等杂文。文内的“政治上的偶像”和“纸老虎”，都是指当时的中国政治制度和当权的大军阀。我认为社会所以如此黑暗腐朽，原因就在于中国的政治制度不行，在于大军阀的鱼肉人民，仅仅同情劳苦人民是不够的，必须从政治上抨击统治人民的反动势力。这反动势力是可以推倒的，民众必须在向反动势力的斗争中求生存。这在当时的世界日报是需要的。世界日报刊登了我这些东西，我对报纸工作也增加了兴趣。从此，我和世界日报的关系也就更进一步稳定，从一般撰稿关系，进一步成为专职的编辑。白天到大学上课，挤出时间来写杂文，晚

上到世界日报当编辑。我分工编教育新闻。在我去之前，世界日报已有个《教育界》专栏，在知识分子中是比较有影响的。我担任教育编辑后，负责编这个专栏，常常通过所谓“学潮”、教育经费等问题比较明确地反对段祺瑞，指名道姓地批评段祺瑞的教育部长章士钊。一九二六年“三·一八”惨案发生时，正是我任教育编辑的时候。我是法政大学学生，也参加了游行请愿的行列，被挤倒在铁狮子胡同执政府对面的照壁前。我对成舍我叙述了亲身经历和目击的情况。我认为这类重大新闻，可以不安排在七版的《教育界》专栏内，而安排在头版头条去。成舍我同意这样做，而且亲自“跑新闻”、写评论、审编稿件。“三·一八”惨案发生后，从三月十九日到三月二十三日，每天都以头版的全版刊登这个惨案的情况。第一天用大字标题标出《段政府果与国民宣战矣》，第二天的标题是《吊死扶伤，哀动九城》。报道内容强烈谴责段祺瑞军阀政府与人民为敌，但由于世界日报的立场和我当时的觉悟水平，报道的基调还只限于爱国主义，声援北平各团体在天安门举行国民大会。对中国共产党因辛丑条约签字国对大沽问题向我提出横暴无理之最后通牒而领导各界人民开展的抵抗活动，不可能有深刻的报道，而且报道中还有“受害者并非共产党员，为什么惨遭杀害”等含糊和错误的论调。不过，当时对“三·一八”惨案作了大规模的连续报道，并登载了刘和珍等烈士的遗体照片，在社会上还是有不小的影响。

一度脱离世界日报

世界日报林立于北平各大报之间。各报要发展自己，都要以自己的政治色彩向社会表态，并以此影响读者，争取读者，扩大自己的销路。各报彼此竞争是一方面，另一个更重要的方面是政局的动荡直接影响着各报的兴衰存亡。当时，北平有历史悠久、表现为改良主义色彩的晨报（原来叫晨钟报，是研究系的机关报）。有著名记者邵飘萍主编的进步报纸京报，“三·一八”惨案后，段祺瑞执政府垮台，张作霖取而代之，以“宣传赤化”的罪名，杀害了邵飘萍，京报被封闭。另一家倾向进步、敢于说话的报纸社会日报，主笔林白水也被扣上“通赤”罪名而被枪毙。成舍我也同时被捕，经孙宗琦保释，未被枪毙。在辛亥革命时很出名，当时已经衰落下来的北京日报，我们党想利用这张报纸为我宣传，曾让当时的秘密党员、国会议员胡鄂公找我，商量如何活动来接办北京日报，后来没办成。天主教办的益世报，日本人办的顺天时报等，在当时也是大报。另外，中华日报（政治背景不清楚），无政府主义的国风报，国民党办的民国日报，孔教会办的经世报等，在社会上作用不大，竞争力不强。世界日报在这些报纸中间，是中间倾向进步的一家大报，销路从四、五千发展到上万（当时报纸的销路上万就很不错了。有的报纸只销几百份）。当时北平的晚报，主要有三家。一家是成舍我办的这张世界晚报。一家是季乃时办的北京晚报。季乃时当时表现为中间派，北伐后接近国民党。北京晚报

的政治色彩便随着季乃时的倾向变化而变化。还有一家晚报叫大同晚报。它的主编就是原来与成舍我合作办世界晚报，因意见不合而退出的一个国家主义派人物，叫龚德柏。因为他敢于说话，外号“龚大炮”。这个“大炮”，既向当时的政府放，也向共产党放。大同晚报便是这副面孔。不过，文艺副刊的反共表现还不明显。龚德柏为了和世界晚报竞争，把我和胡春冰拉去编大同晚报文艺副刊。北伐中，国民革命军占领南京后，龚德柏到南京去办救国日报，托一个姓罗的给他管着大同晚报。姓罗的另外办一个《超然通信社》，有他自己的活动，我们怎么编大同晚报，他也不管。我就按照我的意见来办大同晚报。大同晚报的立场、语言都左了。世界日报的经理吴范寰对我开玩笑，说我“篡夺了大同晚报的权”。我笑着回答说：“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龚德柏在南京，看到大同晚报改了模样，很不满意，很快就把大同晚报停办了。我们党自己办的晚报有两家，都没有公开党的面目，是以合法的面孔出现的。一家叫新声晚报，主编是彭芳草。这张报办了不久，就因为暴露而停刊了。还有一家国民晚报。国民晚报本来是国民党的报，由国民党右派罗敦伟创办，后来移交给当时是国民党左派的黄少谷来办。一九二七年上半年，李大钊同志写了介绍信，介绍黄少谷去河南冯玉祥部队工作，黄走前，把国民晚报移交给我、张友鸾、左笑鸿三人。张、左两人都是平民大学新闻系的学生。当时，张友鸾已是世界日报主编，左笑鸿是世界日报采访部主任、社会版编辑，在政治上表现都是进步的。我们每人出一

百块钱，交给黄少谷三百块钱，就把报馆顶下来了。张友鸾、左笑鸿两人都在世界日报上夜班，上午不能来国民晚报。我在世界日报担任教育编辑，比他俩下班早。因此，国民晚报的编辑工作主要由我负责。这样，在大同晚报停办之前，我同时为四家报纸工作。在世界日报当教育编辑，给世界晚报文艺版写杂文，在国民晚报编报之后，立即赶到大同晚报去编报。

时局越来越坏。一九二七年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接着汪精卫叛变。轰轰烈烈的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了。这时候，报纸的政治态度又面临一次考验。成舍我到南京办民生报，到上海办立报，北平的世界日报、世界晚报，他让他老婆杨璠管理。杨璠是女子师范大学毕业生，虽然也可以办办报，但在那个紧张形势下，她害怕了。我们几个在世界日报工作的人员去办国民晚报。对这件事，她很害怕，怕得罪了国民党，祸及世界日报。她对我们提了一个条件：“你们要在世界日报工作，就不要办国民晚报；要办国民晚报，就不要在世界日报工作。”张友鸾、左笑鸿因为在世界日报工作久了，并担任主要职务，接受了她的条件，离开了国民晚报；我没有接受她的条件，要把国民晚报办下去，离开了世界日报（包括世界晚报）。张友鸾、左笑鸿在国民晚报各有投资一百元，由我约另外两个人各出资一百元顶了半俩。一个是陈显文（后叫陈高佣），当时是中共党员（三十年代在上海被捕叛变），担任中华日报的编辑。还有一个人就是武新宇，当时叫武鉴，是师范大学学生，共产主义青年

团员。这时期，我已经入了党。就是我们三个人办这张报，没有另外的记者、编辑，我是社长。这样，我一度脱离了世界日报。

利用世界日报进行合法斗争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我被国民党逮捕入狱。国民晚报也封门了。一九二八年春，我被保释出狱，到天津接上组织关系，在北方局（后改顺直省委）军委领导下工作。一九三〇年底，因国民党天津市委要逮捕我，组织上让我暂去日本。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后，我从日本回北平，正赶上世界日报主笔罗敦伟又南下。世界日报馆临时请了一个叫费巩的主笔。费巩是个博士，会写学术论文，但不会写社论，也不爱干报纸这一行。世界日报就请我去当主笔。世界日报每天要有一篇社论，都由我写。这时候，我在党内的组织关系属特科系统。我采取合法的斗争手段，利用世界日报这块阵地，为我党宣传。国民党的新闻检查机关要求各报宣传反共，否则便滥扣稿件。我要直截了当地作反宣传是不可能的。要揭露国民党反人民的实质，有时不得不借用他们的语言。比如，我写了一篇社论，题为《匪区善后与土地国有》。“匪区”是他们的语言，指我解放区。内容引了一个参加“剿匪”的国民党人的话来揭露“剿匪”的实质。这段话是：“共产党来了，农人都分了土地，从事耕作。剿赤匪获胜，共产党跑了，农民也跑了，于是地主得重返故乡。那末，我们国民党不变成了代表地主的党吗？”有时候，采取

在社论题目中提问题的方式来揭露国民党积极“剿匪”，消极抗日的政策，如社论《日本侵华能防止中国赤化耶！？》有时，拿出国民党一个口号来分析，从分析中对读者进行暗示。“彻底消灭赣匪”，这是国民党的一个口号。我写了一个社论，题目就叫《“彻底消灭赣匪！！！”》。这个“匪”，指的是我红军。文内分析为什么消灭不了这个“匪”，说明共产党的存在，有经济、政治、社会的原因，含蓄地告诉读者：共产党、红军的产生、发展，是社会发展之必然，是消灭不了的。有些问题，则可以从正面直截了当地进行阶级的分析。如关于抗日问题，社论《认清敌军主帅——整个的日本统治阶级》、《我能持久，日必崩溃》、《必须“全国抵抗”“长期奋斗”！》等，就是从正面论述的。国民党把他们腐败统治造成的恶果，常常转嫁于共产党以欺骗人民。只要抓住机会，也可以从正面加以揭露与分析。国民党中央留平办事处举行了《农村经济恐慌及其补救办法》的报告，所举农村经济恐慌之原因，第一条就是“匪乱”。当天晚上，我就写了题为《农村经济恐慌之原因》的社论，第二天登出。社论指出：“盖在现代经济组织下，必然发生农村经济恐慌之现象。此其原因，在：（一）‘耕者无田’，‘有田者不耕’，致终岁勤劳之大众，竟不能饱食暖衣，而所谓地主者，则坐收租税，剥削人民。大多数农村民众，皆陷于窘境！（二）农业生产物……胥为少数地主、富农所占有。（三）土地既为私有，即不能实行农业合作化……”

因为是在国民党统治下进行斗争，利用世界日报社论为

我宣传，总是有限制的。有些社论可以说对我们没有多大的直接用处。有的社论也不免说不到点上或不能具体地联系我国的具体情况。如写学生运动的社论，只能用含蓄的手段，限于民主、爱国的调子，不能点出学生运动是我们党领导的反法西斯斗争。社论《解散学校能消弭学潮耶？》就是含蓄地指出“惟是学潮之发生，实有其经济的、政治的、社会的原因”，对其具体原因，却只指出“教育制度之不完善，教育经费之不充足，以及办理教育者之措施失当”，没有进行一针见血的阶级分析。又如对世界工人运动，虽也介绍一些，但不能具体联系我国实际。象社论《劳动节之历史与意义》就是这样。当时，我要利用写世界日报社论的机会为我宣传，还有其他一些原因，造成我思想上的不明确或实际工作中的困难。我只能按我认为正确的意思去写，我能做到的去做。“九·一八”后，王明路线的口号是：“保卫苏联”，意思是日本侵略中国是为了进攻苏联。我在社论中从不强调这一点。我认为，日本打到中国来，我们不说保卫中国，先说保卫苏联，中国人自己也不好接受，并且给国民党以借口，说共产党要把中国卖给苏联，说苏联是赤色帝国主义。结果，因为我在社论中不强调这个口号，在党内受到批评。我从日本回来，在社论中有时谈日本问题。当时的日本共产党分成两派。一派是正统的共产党，外围组织叫劳农党。持正统派观点的学者认为，日本的社会性质是封建军事法西斯。这派便被称为封建派。另一派是托派。托派的外围组织叫新劳农党。这派认为日本的社会性质是资本主义法西斯，不承

认军事的、封建的说法。对这个问题，在我们国家也有分歧和争论。我在社论中讲到日本问题时，坚持了封建派的观点。社会上一些人和党内一些同志却认为我错了，说法西斯就不能是封建的、军事的，只能是资本主义的。

那时候，我是一面在燕京大学新闻系和民国大学新闻系教书，一面搞政治活动，晚上去世界日报写社论。和蚕一样，每天是三起三眠。早上起来去教书；中午回家，饭后睡一、二小时；下午出去开会或写东西；晚饭后赶紧睡觉，十点多钟赶到报馆写社论，直到天亮回家，再睡一会儿，然后又去教书。每天紧张忙碌，有时不免出笑话。一天晚上，我坐包车去世界日报馆上班，一进门，大家对着我哄堂大笑。原来，我在匆忙中把左右脚的皮鞋穿倒了。我每晚去报馆上班，起床时穿鞋总是不用眼睛，把两脚伸到鞋里就算完事，一向不系鞋带，出了门口便坐到车上，只想着今晚写什么社论，哪去注意鞋子穿得如何。这次在匆忙中穿错了鞋也没发现。还有一次，笑话出在写社论上。社论是每天晚上写。其他稿子先发排，给社论留出一块位置。当时的社论还是文言的，用四号字，一般留一千二百或一千五百字的空位就够了。我每天上班前，在家就注意当天报纸，特别是晚报有什么消息，估计可能有什么发展，准备好资料，带到报馆去。十点多钟，考虑好社论内容，写一段发排一段，最后在小样上把全文整理一下。到凌晨一两点钟截稿，社论就不再改动了。有一天，不知是排字房没有把社论第一段打在小样上，还是没发排第一段。第二天报纸一出来，社论的开头突如其